

## 《三国演义》与人的行为预测

周凤岗

广义的行为科学,是指运用科学的方法研究社会环境中人类行为规律的学科群。包括心理学、社会学、人类学、经济学、法学、伦理学以及学科中与研究人类直接有关的部分。狭义的行为科学,是指以人为核心的管理学。它运用行为科学的原理与方法研究人在工作环境中的行为规律,包括研究组织中的个体行为、群体行为、领导行为和组织行为。其最终目的旨在达到对人的行为的良性控制和引导,以期有效地调动人的积极性,取得最好的工作效益。可是,如何才能达到这一目的呢?关键问题是能够尽早而准确地预测人的行为。古人说得好,“凡事预则立,不预则废。”(《礼记·中庸》)“能前知其当然,事至不惧,而徐为之

图。”(苏轼《晁错论》)如果事先毫无准备,临时抱佛脚,必将惊慌失措,一事无成。那么,人的行为能够准确无误地加以预测么?回答是肯定的。世间任何事物都有规律可循,人的行为也不会例外,《三国演义》中的许多故事可以说是最好的注解。

凡读过《三国演义》的人,最敬佩的是诸葛亮。他神机妙算,对人的行为的预测真可谓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。其中最叫绝的是他对魏延的预测和处置。在第五十三回中,魏延初归刘备,孔明即“喝令刀斧手推下斩之。”玄德惊问孔明曰:“魏延乃有功无罪之人,军师何故杀之?”孔明曰:“吾观魏延脑后有反骨,久后必反,故先斩之,以绝后祸。”玄德:“若斩此人,恐降者

### 《春游郿邑》中的郿邑考

严寿潜等《郑谷诗集笺注·轶诗存疑诗》中录《春游郿邑》,其按语云:

此诗录自孙星衍修《乾隆三水县志》卷一。未知何据。郿邑,唐河东道蒲州猗氏县西南四里有故郿邑,春秋晋地,《左传》僖公二十四年“军于郿”者是也。雷首山近焉。(参《元和郡县志》卷一二河山近焉。(参《元和郡县志》卷一二河东道河东县、猗氏县)

注者将郿邑定为晋地,值得商榷。首先,此诗最早见林逢泰康熙丁巳重修《三水县志》卷四,又见孙星衍重修《乾隆三水县志》卷一。盖孙沿林旧,未加删削。孙星衍是著名的学者,当不有误。三水县即今陕西旬邑县。既然林逢泰、孙星衍将《春游郿邑》收入《三水县志》,则林、孙认为这首诗中的郿邑在三水县而非在猗氏县西南甚明。此诗虽晚出,然林志仅录有关三水的唐诗四首(李、杜各一首)郑谷《春游郿邑》二首),编者当有所据,非滥收诗文充数者可比。

其次,桐邑从汉建置,一至大唐,县城虽偶有迁移,县名或作三水,但建置一直未废。桐字较僻,作为县名,往往误写作郿。盖因春秋时有郿伯,郿又系邑字旁,故有人想当然地写为郿。将桐邑误作郿邑,此诗即其一例。不能因为误写,旬邑就由陕西关中移到晋西。

其三、郑谷《春游郿邑》诗中涉及的六个地名:峪评、石门、金泉、三水镇、五林村、夫人冢,大多可考。

石门山、桐邑故城(即三水镇),唐人李吉甫《元和郡县志·关内道三》就有详实地记载:

石门山,在县东五十里。峰岩相对,望之似门。

桐邑故城,在县东二十五里,即汉桐邑县,属古扶风。古郿国也,《左传》云:“毕、原、丰、郿,文之昭也。”

石门山与桐邑故城,在康熙《三水县志》中,也有较详的记载,兹不赘。另外,白虎峪、金沙泉在该志中也有记载:

白虎峪,在邑西北一十五里,即唐郑谷诗“峪评白虎藏岩洞”是也。茂草四围,长峪七折,野境殊为清幽。

金沙泉,在邑北一十五里,其泉出半川溥原之下,《通志》云:昔有人饮此水见金沙灿烂,故名之。唐郑谷所谓“地涌金泉过石门”,即此也。

五林村、夫人冢或为唐时桐邑小村镇、小景点,未能详考。

根据以上三点理由,我以为郑谷《春游郿邑》中的郿邑,即今陕西旬邑县,而非山西临猗(唐猗氏)。旬邑为古豳所在地,郑谷居长安多年,或竟发古之幽思,遂有桐邑之游,留下了《春游郿邑》的诗篇。

人人自危，望军师怒之。”孔明虽怒而未杀之，但仍以“若生异心，我好歹取汝首级”相警告。其后，孔明虽怜其勇而用之，但从未放松过对他的警惕，故在临终之际，预伏马岱于魏延身边，待其反形毕露之际而除之。可见，孔明始终玩魏延于掌中。故能放手用之于未反之时，及时除之于反叛之始；处其生用竭其力，处其死易如反掌。

刘备被称为枭雄，他对人的行为预测的能力，与孔明相比，实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刘备本不过一介平民，然终能建立蜀汉，三分天下而有其一，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原因是有过人的知人本领。世间结义兄弟多矣，一旦利害相临，反自成仇者不计其数，然关张一旦跟随刘备，便富贵不能淫，威武不能屈，赴汤蹈火，至死不渝；赵云弃公孙瓒而投刘备之后，忠心耿耿，有死无二。孔明“两朝开济老臣心”（杜甫《蜀相》），“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”（《出师表》）。若非刘备有眼力，重用此数人，怎会如此？对于马谡的任用，就足以显示刘备与孔明知人方面的高下来了。刘备在临终之际，“谓孔明曰：‘丞相观马谡之才何如？’”孔明曰：‘此人亦当世之英才也，’先主曰：‘不然。朕观此人，言过其实，不可大用。丞相宜深察之。’”（第八十五回）终因孔明未听，以至演出了“马谡拒谏失街亭”，“孔明拜泪斩马谡”的悲剧。

可见，刘备之所以功业赫赫，孔明之所以能料事如神，其源概不出于能知人。只要能准确地预测他人的行为动向，就可能顺势而为。然而怎样才能预测他人的行为呢？最好的知人之道莫过于先知其前而推知其后。记得毛泽东同志对蒋介石有过一段评价：“我们从他的过去就可以知道他的现在，知道他的过去和现在，就可以知道他的将来。”毛泽东用的就是这一思维逻辑。孔明所以能准确地预测待己死后，魏延必反。用的也是这一思维规律。在第四十一回中，魏延背叛刘琰，杀死守门将士，开门招引外敌刘备，其首次登场即以背主求荣的角色出现。第五十三回中，魏延再次扮演同一角色，杀死主人韩玄，并开门纳降。一之为甚，其可再乎？魏延实非头上真有反骨，而是具有反叛的个性习惯。其实，孔明的判断逻辑十分明晰：“食其禄而杀其主，是不忠也；居其土而献其地，是不义也。不忠不义，且已成性，留用此人，不免有养虎伤身之忧。故当初真的杀了他，也不可谓之不当。”果然，孔明一死，魏延即反，印证了孔明的预测。

人的行为源于人的欲望，欲望又是激发人的心理活动的最基本因素，也是人的行为产生的最初原动力。每个人都有欲望，如色欲、权欲、名欲、利欲等。但

人各不同，欲望也有强弱之分，缓急之分，明暗之分。表现在外在举止行动方面，则有的人的行为是其本性的直接展露，故一目了然；有的人行为隐蔽，展现的是人性的假象，且随机性很强，如水无定体，依物成形。故难于发现。前者如吕布、魏延，其未来的行为好把握。后者如孔明、曹操、刘备等，其未来的行为就难于测知了。等五十七回，周瑜死后，孔明过江东，经至柴桑口吊丧。”孔明祭毕，伏地大哭，泪如泉涌，哀恸不已。众将相谓曰：‘人尽道公瑾与孔明不睦，今观其祭奠之情，人皆虚言也。’鲁肃见孔明如此悲切，亦为感伤，自思曰：‘孔明自是多情，乃公瑾量窄，自取死耳。’结果被孔明如此一哭，江东人没了主见，恨他的不恨了，杀他的不杀了。其实孔明在荆州夜观天文之时，“见将星坠地，乃笑曰：‘周瑜死矣。’”又对刘备讲：“亮当以吊丧为由，往江东走一遭，就寻贤士佐助主公。”孔明到底是真哭还是假哭，不是很明了了吗。但如掩卷细思，尚在现实生活中，面对曹魏强敌，孙刘非联盟无以生存之际，失一抗曹英雄，能不悲乎！如此推断，伏地大哭当是真的。可见，孔明是真哭还是假哭，难以真知。再举曹操为例，操“常吩咐左右，‘吾梦中好杀人。凡吾睡着，汝等切勿近前。’”一日，昼寝帐中，落于地，一近侍慌取复盖，操跃起拔剑斩之，复上床睡，半晌而起，佯惊问：‘何人杀吾近侍？’众以实对，操痛哭，命厚葬之。人皆以为操梦中杀人。”作者说得分明，这是曹操为“恐人暗中谋害己身”而制造的冤案。更有杨修点破真相：“丞相非在梦中，君乃在梦中耳。”但我总有点为曹操抱不平。从“落被于地”这一细节看，曹操当已睡着，且有“梦中好杀人”，“切勿近前”的声明在前，起码不是诱杀，至多以为是刺客而误杀罢了。倘如是，也就算不得阴谋了。看来，真真假假，只有曹操一人知之。可见，预测他人的行为，不能一成不变，当因人、因时因地而变，只有这样做才能达到料事如神的程度。

作为行为科学，不但应当研究人的理性行为，更应当努力去研究人的非理性行为。非理性行为表现非常普遍，它不仅存在于精神失常的人身上，也存在于精神健康的人身上。那么怎样才能准确地预测非理性行为呢？理性人物多以利害关系为行动准则，权衡利弊，两利相权取其重，两害相权取其轻。即使顾及道义，亦常是沽名钓誉，最终目的还是为利益服务。非理性行为则以感情为行为准则，心血来潮，处事常不顾个人利害，思维方式为直线性、突发性，不可逆性。一旦激动情绪，死生不顾。《三国演义》第二十三回中，祢衡裸衣骂曹操的行为，就是一种非理性行为。祢衡

## 校园文化与潜课程关系探微

翁春敏

近些年来,校园文化以其独特的方式作用影响着学校教育,并向社会展示其价值,已引起教育理论的极大关注。

校园文化是一种亚文化,是学校所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。从广义上讲,校园文化是以特定的主体(学校管理人员、教师、学生及职工)为载体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总和。其外延相当广泛,包括物质方面的环境布置、图书馆、俱乐部、教学资料及设备、报刊、杂志、广播、电视等等;精神方面的道德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、信仰、兴趣爱好、人际交往、校风、班风、学风等;制度方面的行为规范、文明公约、规章制度、社团

活动、正式集体、非正式群体、报告会、沙龙等。从狭义上讲,校园文化是指一种精神生活,是学生的创造性活动和潜能释放之总和,即为相对于课堂文化而言的课外文化。

然而,一段时期以来,校园文化往往被人们视作“潜课程”(又称“隐性课程”),也有人给两者之间划上等号,即把校园文化看作学校的环境、气氛和风气。在他们看来,这种潜课程既不属于第一类课程(列入教学计划的课程),也不属于第二类课程(课外活动),而是对学生产生教育作用的第三类课程。那么,校园文化与潜课程是否能完全划等号?笔者将在本文中

行为乖戾而自以为是,目空一切而出口狂言,骂丞相、辱群臣、讥太守、怒州牧;他使气任性,不按理性办事,足显其性格上极不成熟的一面。曹操和刘表对这种非理性行为有足够的认识,因而没有与之一般见识。操曰:“此人素有虚名,远近闻名,今日杀之,天下必谓我不能容物。”于是派冻衍出使荆州,说刘表来降,实欲借刘表之手以杀之。曹操的思维逻辑是这样的:杀一狂徒,自己亦成狂徒耳;狂徒终是狂徒,非狂者能容他,狂者必不容他;故所到之处必有杀他之人,必有杀他之日;何不借手他人,免使自己白落恶名。刘表识破曹操之计,采取同样手段,又转使黄祖处,使祢衡死于黄祖之手。

在预测和处置非理性方面,孔明更为得心应手。黄忠是个极具荣誉感和英雄主义精神,又最怕人家说他年老无用的老将。这种心理,从本质上讲是非理性的,极容易因受刺激而产生非理性行为。孔明深知其道,专用激将法刺激这位老英雄的这根神经,使他的荣誉感和英雄主义爆发出来,表现出老当益壮的气概来。因此,即使心中十分想用他,口中偏说将张飞、云长调来,否则“无人可当。”“汉升虽勇,怎奈年老。”孔明所以心是而口非,在与刘备的谈话中托出了本心:“此老将不着言语激他,虽去不能成功。”可见,若将非理性巧妙地用于正当场所,可以激发出无比巨大的力量,恰恰是理性或处于理性控制下的人所难以达到的。

但是,在同一个人身上,往往既有理性的一面,又有非理性的一面,只是所占比例不同。在不同的时间和外界环境下,两者之间的比例也会发生转化。如能准确地预测并巧妙地加以转化,对做好工作是十分有益的。在六十五回中,马超降刘备不久,云长知马超武艺过人,要入川与之比试高低。刘备闻之十分忧虑。孔明深知云长秉性高傲,唯我独尊;又深知云长深明大义,顾全大局。于是即刻给云长写信道“亮闻将军欲与孟起比高下,以亮度之;孟起虽雄烈过人,亦乃黥布、彭越之徒耳;当与翼德并驱争先,犹未及美髯公子绝伦超群也。今公受任守荆州,不为不重,倘一入川,若荆州有失,罪莫大焉。惟冀明照。”书中之言,前边几句为满足其虚荣心,亦是欲擒故纵之法;后几句是唤醒其理性回归。云长读罢来信,觉得有情有理,果然打消了入川之念,并满意地说:“孔明知我心也。”由于孔明的巧妙处置,成功地避免了一场窝里斗。

人的行为是复杂的,有理性与非理性之分,理性行为又有直露与隐藏之差,非理性行为也有病态与非病态之利,所以预测并不容易。但又要认真研究,还是有规律可循的。远在三国时期的孔明、曹操、刘备等英雄人物,虽不知道行为科学这一新学科、新概念,但他们的所作所为,无意中为今天的行为科学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范例。